

作者的期待

李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各位老师下午好,很荣幸能参加这个座谈会。我自从读博以来开始自己投稿,文史类好的刊物差不多都投过,投稿的经验和教训还算比较丰富,我就结合自己的投稿经历谈一些看法。之前也给《文献》投过两次稿,第一次我记得是2014年,没能中。当然这主要是我的原因,自己投稿之前的准备工作不到位,那篇论文太长了,大概四万多字,远超《文献》杂志当时发文字数的要求。类似这种不遵守刊物发刊风格、要求和规范而盲目投稿的情况,现在恐怕还有很多,尤其是在读的硕博研究生以及一些年轻学者。所以,建议《文献》不妨明确交待刊物的发刊旨趣、意向以及规范、字数要求等等,对不符合的稿子可以不予考虑。这样不仅能为编辑部前期审稿工作省去不少时间,对于那些投稿前不作准备或者准备不充分就盲目投稿的年轻学者来说,也是一种提醒。刚才看了今年第一期的论文,发现有几篇长文,差不多都有三四十页,那差不多就是四五万字了,这在以前似乎很少见,希望以后每期都能发几篇长文。现在由于学术规范等原因,在较短的篇幅之内很难进行充分的讨论,也就解决不了重大的问题。

相比较文史类其他的好刊物而言,《文献》以前的审稿期相对要长些,我记得是六个月,而大部分期刊是三个月,现在缩短了不少,这样就好很多。其实造成审稿时间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外审拖得时间长,主要是知名的教授们实在太忙了,所以不妨找研究领域相关的青年学者作为外审。一来青年学者时间和精力都相对充裕,二来他们也更愿意关心学界最新的动态,态度往往也更为认真,据我所知很多年轻学者审稿时都会去核对原始文献。这样一来,审稿标准其实并不会降低,而时效反而会有提高。

另外,我觉得可以考虑发些学术札记。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都是让我们从写札记入手。札记从具体问题入手,篇幅则可长可短,有些随着积累不断增加能敷衍成为完整、规范的论文。学术札记现在很难发,其实它的学术性很强,短小精悍的札记还可以节省版面。我注意到《文献》有“文史新探”专栏,这个栏目的论文其实与学术札记在形式上比较相近。我来之前还特意查了《文献》2018年总目,去年共有四期设了这一栏目,总共刊发34篇论文,在所有的栏目中发文数量最多。学术札记完全可以并入这个大栏目内,只是文

章可能相对体量小一些,或者可以称之为“小而精”的“文史新探”。

再说由“文史新探”想到的吧,所谓“新探”,要么有新材料,要么有新方法。当然,现在更多是新材料,尤其是新出土的材料。我本人最近两年主要精力在南朝,也关心北朝隋唐,现在南朝新材料较少,而北朝隋唐新出土的墓志、造像很多,利用这些新材料写的论文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单篇的墓志考释。个人感觉,单篇墓志考释很难写出有深度的论文,往往需要一组或一类具有相似性质的新材料,或者以新出土墓志为线索讨论新的问题,建议《文献》开放更多的空间给这类论文。而那种比较重要的单篇新材料,似乎可以以简报等形式刊布。

目录学再出发

马楠(清华大学历史系)

目录学是文献学的主要分支,目前也面临着尴尬境遇。余嘉锡、王重民等先生开拓了目录学研究的诸多方向,研究方法亦随物应机,广有启益。而近几十年除张固也《新唐书艺文志》、《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研究以外,可说鲜有突破;目录学的教材、论文,也集中于“某目的分类体系”、“某家的目录学思想”,研究视野狭窄,议题严重固化,甚至对目录的认识也较余、王有退无进。

目录学号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片面强调书目编纂过程中的学术理念,不得不说是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之一。《隋书经籍志》称书目为“簿录”,最近其实:《七略》《汉书》、王志阮录固然是书目轨范,《宋书·且渠蒙逊传》所载元嘉十四年茂虔所献凉州诸书,又何尝不是书目?书目既是理念的,更是实践的;既有自上而下的辨章考镜、删并裁断,却更是文员胥吏自下而上点检登录、抄撮成篇的结果,甚至后者才更接近目录的本质。与之对应,研究古代书目,不能全然将之视作某个“目录学家”的学术思想体现,更应看作通过某种具体可操作的编纂方法形成的结果,视作某个时段书籍史的一个截面。

例如《隋书经籍志》例叙撰人职衔,从“可操作性”上考量,绝非魏徵等贞观馆臣逐一考订的结果,必有《七录》等书作为材料来源和编目基础。又如《宋史艺文志》,总叙称以三朝、两朝、四朝、中兴四种《国史艺文志》“删其重复,合为一志”,而分析《宋志》具体操作流程,则当以《中兴志》为蓝本,主要利用《四朝志》进行补充与修订,最后用《三朝志》《两朝志》进行补充修订,“不著录”部分又添入元人所见宋代著述。元代馆臣采用这种编纂方法,道理也非